

##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依然具有强大生命力

■韩庆祥

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与功能，有五个基本思想。

一是关于哲学与世界的关系。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一条)指出：“以往的哲学主要在于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这说的是，哲学既要解释世界，更要通过实践改变世界。

二是关于哲学与时代的关系。马克思在《第179号“科隆日报”社论》中指出：“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上的精华，哲学要从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问题是时代声音，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这就是说，哲学要关注时代和一个时代的问题，时代精神就体现在时代问题之中；哲学要以问题为中心抓住时代的本质，读懂时代这本书，哲学只有体现时代精神，反映时代问题，才能发出时代的声音。

三是关于哲学与国家需要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践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为基础的。”这是说，哲学理论产生于一个时期的需要，其功能也在于满足国家发展的需要。

四是关于哲学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马克思认为，“哲学家是自己的人民的产物，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都汇集在哲学思想里”；“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这说的是，哲学要关注人民群众的生存境遇与发展命运，要汇聚人民智慧，反映人民呼声，为大众立言，为大众提供精神食粮，丰富大众的精神世界；哲学要通过改变人而改变世界。

五是关于哲学与实践的关系。马克思说：“哲学在理论上是实践的，哲学要与实践发生接触。”就是说，哲学在本性上要与实践发生接触，才会有生命力。总之，马克思要终结一切不与世界、时代、国家、人民、实践、现实问题接触的旧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性是与世界、时代、国家、人民、实践、现实问题发生接触，其根本基石和本质特征是社会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既要正本清源，弄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来面目，也要从哲学上解释清楚我们所面临的世界，更要坚持研究“中国问题”的路线；研究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哲学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既要读好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文本，也要读好时代精神、现实社会、实践生活、人民群众这些书。马克思主义哲学既要具体走向抽象，透过具体现象把握本质和规律，也要从抽象走向具体，把哲学理念变成现实。只有这样的哲学，才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

## 人民出版社推出“政治文化丛书”

讲好最经典的中国故事，建设新时代的政治文化。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政治文化丛书”日前在京首发。

据介绍，该丛书首批出版了5册，包括《共产党人的心学——政治文化小札》《信仰的底色——红色基因解码》《历史大棋局——古代雄主用人评略》《走出迷局——审视历史中的人性》《书卷多情似故人》，内容涉及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锤炼党性的动人故事，优秀传统文化中选人用人智慧的深度挖掘与研究，我国古代国家治理经验的梳理与总结。

丛书作者之一陈家兴认为，丛书的出版有利于从政治文化上正本清源，助力形成良好政治生态，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有关专家认为，这套丛书最大的特点是可读性极强，有料、有故事，有新见解、有情怀。丛书作者有党报资深评论员，有党史党建研究专家，也有行政领导干部，体现了在党爱党、在党言党、在党忧党、在党为党的现实关怀。

(坤宁)

# 渡河，从找到船桥开始

——读金冲及《向开国领袖学习工作方法》

■高长武

掌握正确的工作方法对于做好工作至关重要。对此，1934年毛泽东曾说过一段名言：“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新中国的开国领袖们摸索、总结、形成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认真总结这些方法，无疑十分必要。中共党史和中国近现代史著名专家金冲及先生近年出版的《向开国领袖学习工作方法》一书，就在这方面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字，是唯物论，后六个字是辩证法，合起来就是唯物辩证法。

所谓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就是实事求是，使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进行充分而正确的调查研究。陈云认为：领导机关制定政策，要用90%以上的时间作调查研究工作，最后讨论作决定用不到10%的时间就够了。1961年六七月间陈云做的青浦农村调查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当时陈云在青浦县小蒸公社住了半个多月，上午开座谈会，听取群众和公社干部的意见，下午到田头、养猪场和农家作实地考察，之后他又到与青浦情况相仿或不同的江苏、浙江的多个县进行了调研，还与上海市委、江苏和浙江省委的同志交换了意见，最终形成了三个调查报告，分别对群众议论最多三个问题提出了建议：母猪私养比公养好处多，种双季稻不如种蚕豆和单季稻，农民的自留地应该根据中央规定留足。这些建议为此后中央进行农村粮食生产和经济调整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参考。

所谓交换、比较、反复，就是在了解一些情况、形成初步意见后，还要互相交换意见，并对各种不同意见进行多方面比较，而且要留出一个反复考虑的时间，慎重做出决策。1953年粮食统购统销的决策就是一例。当时全国粮食供销紧张，投机商人趁机哄抬粮价，导致粮价上涨、抢购成风，形势复杂严峻。对此，陈云形容说：“我现在是挑着一担‘炸药’，前面是‘黑色炸药’，后面是‘黄色炸药’。如果搞不到粮食，整个市场就要波动；如果采取征购的办法，农民又可能反对。两个中间要选择一个，都是危险家伙。”面对这种局面，陈云广泛听取意见后，提出了只配不征、只征不配、原封不动、统购统销等八种处理办法，在对各种办法的利弊进行反复比较和慎重考虑后得出结论，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决策是有效的正确的。

开国领袖们的领导智慧和工作方法，是需要我们认真发掘的巨大精神宝藏。而在认真发掘这一宝藏方面，金冲及先生此书给我们做出了榜样和示范。

(作者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

于对事物全局和发展规律的深刻洞察和把握而作出的有根有据的判断。

毛泽东善于对一些重大问题作出正确预见。比如，在全面抗战爆发还不到一年的1938年五六月间，“中国必亡论”“中国速胜论”甚嚣尘上之时，毛泽东就在《论持久战》中，对抗战作了预见，认为经过防御、相持、反攻三个阶段持久抗战，中国必将取得胜利；当抗日战争还处于紧张关头的1940年，他已经在擘画未来的新国家和新社会，写出了《新民主主义论》；当1947年夏，解放军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之后，他经过分析提出一个重大形势判断：“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个事变一经发生，它就将必然地走向全国的胜利”。中国革命后来发展的进程都印证了毛泽东的这些预见。

事物是由发展不平衡的一个或多个矛盾构成的，同一矛盾有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不同矛盾之间有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之分。毛泽东指出，在工作中抓住并解决了主要矛盾或矛盾的主要方面，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反之，“万千的学问家和实行家，不懂得这种方法，结果如堕烟海，找不到中心，也就找不到解决矛盾的方法”。

辽沈战役中攻打锦州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当时我们面对的主要问题是，在国民党方面还举棋不定，快速行动，切断东北与关内联系，将国民党的精锐部队堵在关外加以歼灭，为关内的战略决战乃至全国的解放创造有利条件。而锦州就处在一个关键的战略地理位置上。因此，毛泽东从解放战争的战略全局出发，要求东北野战军不惜冒巨大风险，置长春、沈阳之敌于不顾，坚决长途奔袭锦州。这一战略决策以为此后战局的发展所证明。

一贯的求真务实和反对极端主义

周恩来工作方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求真务实，反对极端主义。早在1922年周恩来就曾自我评价说：“我求真的心又极盛”。诚然，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他时时刻刻都以求真务实、戒慎恐惧的态度，一丝不苟地按照实际情况办事，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夙夜在公、鞠躬尽瘁。

周恩来常讲，衡量一件事“是老是坏，要从客观存在出发，不能从主观想象出发”。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中出现盲目追求发展速度、急躁冒进的情况，周恩来多次强调要加强调查研究，尊重客观规律，一切从客观实际出发。1956年2月，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他针对“急躁冒进的苗头”指出，

“领导者的头脑发热的，有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超过现实可能和没有根据的事，不要乱提，不要乱加快，否则就很危险”。在七千人大会上，他进一步阐释说，求真务实、实事求是，就是“说真话，鼓真劲，办实事，收实效”。为此，全党要加强调查研究，深入联系群众，善于倾听不同意见，做到“兼听则明”，尽可能全面地了解群众需要和实际情况，把主观能动性和客观可能性结合起来，避免违背规律、脱离实际、过犹不及。

在外交工作中，周恩来也一直遵循求真务实和反对极端主义的工作方法。在重大外交问题上，周恩来始终坚持立场和原则，主张什么、反对什么，从来都是态度鲜明；同时，为了给国内建设争取一个比较有利的国际环境，在具体的细节问题上，他反对极端和简单的做法，而是主张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注意从实际出发，本着求真务实的态度，既充分阐明中方立场、主张和理由，坦诚相见，以理服人，又注意倾听对方的思想和要求，能够设身处地体谅对方的难处，使问题尽可能得到合情合理地解决。在周恩来的长期外交实践中，比如在访问印度、缅甸时，首倡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日内瓦会议上，为解决印度支那问题积极开展多边外交；在万隆会议上，提出著名的求同存异方针，推动亚非拉国家团结；出访亚非欧14国，提出中国处理同非洲国家、阿拉伯国家关系五项原则和中国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八项原则；通过多次谈判，打破坚冰，实现中美、中日关系正常化，打开中国外交新局面等，他都始终注意运用这样的工作方法，并取得了实效。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

陈云工作方法的最突出特点，是极端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并注意结合革命和建设的客观实际把它运用到具体工作中。

他曾结合自己哲学的工作经历说：“学习哲学，可以使人开窍。学好哲学，终身受用。”他认为，党员干部尤其需要重视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因为这“是思想上的基本建设”，“要把我们的党和国家领导好，最要紧的，是要使领导干部的思想方法搞对头，这就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有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上、工作上才能真正提高”。

他总结实践经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的关键要求凝练概括为一句话：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前九个

## 影响我的一本书

# 《老人与海》：一座值得被挖掘的冰山

■张洁

亚哥在经历了84天一无所获之后，仍抱有希望，他认为“不抱希望是很傻的，不抱希望是一种罪”。三天三夜在茫茫大海上与大马林鱼殊死搏斗，一个人面对孤独、面对疼痛，终于捕到了那条长18英尺，重1500磅的马林鱼。在归途中，却因为马林鱼的血腥味招来了一波又一波鲨鱼的掠食，老人用手中仅有的渔具击退鲨鱼，但最后马林鱼还是只剩下头和后面拖着长长的白骨。老渔夫并没有因为这番经历而沮丧，休整以后，重新准备渔具，再次出发。

表面上看这部小说是一个悲剧，老渔夫历经磨难，一无所获，但是意在文外，在作者的描述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乐观不屈的老渔夫的形象。这正如海明威本人，在小说《过河入林》受到评论界广泛争议后，他并没有消沉，而是

远离人群，在古巴哈瓦那郊区创作《老人与海》，小说一经问世，便引起了国际上的强烈反响，相继获得1953年美国普利策奖和1954年诺贝尔文学奖。

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大海就像我们的人生道路，时而风平浪静，时而惊涛拍岸，我们只有独自驾驶着生活之舟去面对。《道德经》中描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意思是天地没有任何偏爱，把万物当作刍狗，让它们自行荣枯。自然法则对世间万物都是公平的，所以不要因为遇到了挫折就认为生活对我们如此的不公平，殊不知“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我们遇到灾祸要保持一份乐观，遇到喜事也要保持一份谨慎。

面对未来，我们要心存希望；而面对当下，我们更要脚踏实地。正如老渔夫在捕鱼

时，自言自语所说：“你要永远想着一件事，那就是你正在做的事，它不容有错。”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只要是我们当下正在做的事情，不论难易大小，都一定要做好，因为花费的都是自己宝贵的时间。曾国藩说过：“盖士人读书，第一要立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识”需要不断积累，“恒”体现了一个人做事的毅力，更要在平日中下功夫。“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结果是从过程中来，只有明白了这个逻辑，才会不驰于空想，脚踏实地的去生活，在机会来临时，才有能力把握住。正如小说中所说：“当好运来临时，你已经准备好”。

海明威给我们展现了人生这座冰山的一角，水下的冰川还有待我们自己去挖掘。

(作者单位：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纪委)

## 干部书架

这本书既是一本“小书”，也是一本“大书”。说它“小”，主要是说全书才10万字出头，而且用金先生自己的话说，“不是有计划写的”，是长期工作中“一鳞半爪地写过的一些自己的粗浅体会”的合集。但它实际上又是“大”的。“一鳞半爪”“粗浅体会”，这是金先生自谦之言，实际上该书很大气，简约而不简单，很好地把开国领袖的工作方法这么大的题目化大为小、化繁为简，精到地概括和刻画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陈云等在工作方法上各自的突出特点。这充分展现了金先生丰富的治学经验和深厚的治学功力，颇值得后学们认真学习。限于篇幅，这里只结合书中所述谈谈毛泽东、周恩来、陈云工作方法的突出特点。

高度的战略思维能力

毛泽东是伟大的战略家，领导艺术高超，在其工作方法和领导艺术中，最突出的就是高度的战略思维能力。所谓战略思维能力，主要是指具有全局性的眼光、敏锐的预见性，并基于此，善于抓住和解决主要矛盾。

事物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毛泽东经常强调，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既要看到部分，更要看到全局，“没有全局在胸，是不会真的投下一着好棋子的”。只有对全局有一个清楚全面的了解，才能在工作中制定出正确的政策举措，对于那些对全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关键政策举措更是如此；反之，就会“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抗美援朝就是毛泽东全局在胸下的“一着好棋”。对此，毛泽东1950年10月27日与周世钊、王季范谈话时分析说：对刚刚成立的新中国来说，要恢复经济、搞建设，需要一个比较长的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这段分析可谓鞭辟入里。后来历史的发展证明，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的确起到了毛泽东所预测的“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的效果。

事物又是发展变化的。因此，要做好工作，还应具有预见性。对于增加预见性与做好领导工作的关系，毛泽东有过精彩评论：“什么叫领导，领导和预见有什么关系？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也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当然，预见不是毫无根据的臆测，而是基



1932年，海明威在他的纪实性作品《午后之死》中，提出了著名的“冰山原则”，他以“冰山”为喻，认为作者只应描写“冰山”露出水面的部分，水下的部分应该通过文本描述让读者自己去想象补充。正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每个人去看海明威的《老人与海》都会有不同的理解，它没有标准答案，有的只是你对生活、对世界不同的理解。

“人可以被打败，但不能被打败”，大概是这部小说中最广为人知的一句话。老渔夫圣地